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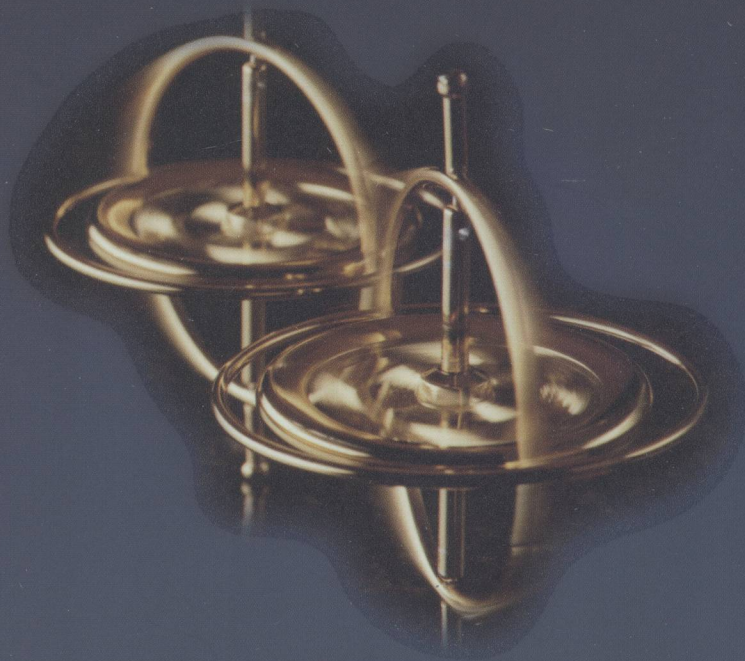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科学
技术
哲学
文库

主编 郭贵春

技术解释学

◎ 赵乐静 /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技术解释学

赵乐静 著

本书受教育部2004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04JZD000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本体论解释学视角,探索了解释学在何种意义与程度上适用于技术的问题。在强调意会理解的前提下,考察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解释学基础上统一的可能,认为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的技术有着显著的人文科学特征。本书以家族相似谈论和描述技术研究了技术知识、技术活动和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对工具的“上手”、“在手”状态以及技术理解的“前结构”与解释学循环进行了讨论。在肯定当前正在发生的“技术认识论转向”积极意义的同时,强调了技术知识与技术理解意会的重要性;在将社会行为视做本文的条件下,对技术建构论进行了解释学阐释;从广义对称原则出发,以技术人造物的功能意向性为依据,形成将技术人造物看做本文的理论与分析方法。

本书可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参考,适用于工程技术、设计人员阅读,对有兴趣思考、探索人文与科学“视界融合”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思想者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和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解释学/赵乐静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978-7-03-025678-2

I. 技… II. 赵… III. 技术哲学—阐释学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901 号

丛书策划: 孔国平 / 责任编辑: 孔国平 郭勇斌 卜 新 / 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3/4

印数: 1—2 500 字数: 312 00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卢 风	邢冬梅	任定成	刘晓力
成素梅	乔瑞金	陈 凡	李 红	李伯聪
李 侠	李建会	张华夏	张培富	肖 峰
洪晓楠	胡新和	殷 杰	郭贵春	高 策
蔡 仲	魏屹东			

总 序

怎样认识、理解和分析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是我们把握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推进它在可能发展趋势上获得进步的重大课题,有必要将其澄清。

如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了一部书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书中有作者明确地讲:“科学哲学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在整体的文化范围内,科学哲学现时甚至不是最宽广地反映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其他科学研究的分支,诸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论争的对象。那么,也许这导源于那种不景气的前景,即某些科学哲学家正在向外探求新的论题、方法、工具和技巧,并且探求那些在哲学中关爱科学的历史人物。”^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视角上地位的衰落。而且关键的是,科学哲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探求现实的科学哲学的出路,都被看做是一种不景气的、无奈的表现。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哲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的研究范式。因为,一个学科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纲领;而没有了范式和纲领,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科,同时能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位就必然地要降低。因而,努力地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发展科学哲学,在这个范式的基底上去重建科学哲学的大厦,去总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就是相当重要的了。

换句话说,当今科学哲学是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非突破”的时期,即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欧洲大陆哲学与大西洋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常规科学的进展与一般哲学解释之间的碰撞与分析。这是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必然地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从20世纪的后历史主义出现以来,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第二,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无论是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出身

^①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XVIII. Logical Empiricism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6.

的科学哲学家,对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把握本质的困难,它所要求的背景训练和知识储备都愈加严苛。第三,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它局限的一面,需要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汲取和借鉴更多的方法论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忽略的一面,轻视了它所具有的本质的内在功能,需要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发扬光大。第四,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综合各种流派、各种传统去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任一种单纯思维趋势的片面性,但是这确是一条极易走向“泛文化主义”的路子,从而易于将科学哲学引向歧途。第五,由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淡化及研究纲领的游移,导致了科学哲学主题的边缘化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试图用从各种视角对科学哲学的解读来取代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或者说把这种解读误认为是对科学哲学的主题研究,从而造成了对科学哲学主题的消解。

然而,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它的科学方法论的内核不能变。这就是:第一,科学理性不能被消解,科学哲学应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第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能被消解,它从来就是科学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三,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及其语境论的基础不能被消解,因为它是统一科学哲学各种流派及其传统方法论的基底;第四,科学的主题不能被消解,不能用社会的、知识论的、心理的东西取代科学的提问方式,否则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弘扬科学理性就不叫“科学哲学”,既然是“科学哲学”就必须弘扬科学理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理性与非理性、形式与非形式、规范与非规范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统一。我们所要避免的只是“泛文化主义”的暗流,而且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泛文化主义”,都不可能指向科学哲学的“正途”。这就是说,科学哲学的发展不是要不要科学理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弘扬科学理性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弘扬的问题。中国当下人文主义的盛行与泛扬,并不证明科学理性的不重要,而是在科学发展的水平上,由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激发了人们更期望从现实的矛盾中,通过人文主义的解读,去探求新的解释。但反过来讲,越是如此,科学理性的核心价值地位就越显得重要。人文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理性作基础,那就会走向它关怀的反面。这种教训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很多的,比如有人在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时,曾以“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为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人本主义肯定是没错的,但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就必然地走向它的反面。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并不存在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文理性拓展和延伸了科学理性的边界。但是人文理性不等同于人文主义,这正像科学理性不等同于科学主义一样。坚持科学理性反对科学主义,坚持人文理性反对人文主义,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要坚守的目标。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存在的某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论与 20 世纪

后半叶历史主义的多元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主义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去诉求科学理论进步纲领的多元性;而现今的多元论,是站在文化分析的立场上,去诉求对科学发展的文化解释。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扩张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但它却存在着文化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消解科学理性的倾向性。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混为一谈。这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技术哲学自身本质地赋有着更多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以单纯科学理性的要求为基底的。

在世纪之交的后历史主义的环境中,人们在不断地反思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和历程。一方面,人们重新解读过去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以适应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重新解读,找出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尤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走向。有的科学哲学家在反思 20 世纪的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即“广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存在着五个“引导性的难题”(leading problems):

第一,什么是逻辑的本质和逻辑真理的本质?

第二,什么是数学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数学命题的本质、数学猜想的本质和数学证明的本质?

第三,什么是形式体系的本质?什么是形式体系与希尔伯特称之为“理解活动”(the activity of understanding)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第四,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意义、指称和真理的本质?

第五,什么是理解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感觉、心理状态及心理过程的本质?^①

这五个“引导性的难题”概括了整个 20 世纪科学哲学探索所要求解的对象及 21 世纪自然要面对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讲,在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中,理论模型与实验测量、模型解释与案例说明、科学证明与语言分析等,它们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整体,或者说整体性的科学方法论,整体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以,从广义的科学哲学来讲,在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是联结在一起的。同样,在 21 世纪的科学哲学进程中,这几个方面也必然会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只是各自的研究层面和角度会不同而已。所以,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都是整个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在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中是统一的和一致的。这种统一和一致恰恰是科学理性的统一和一致。必须看到,认知科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科学理性的一致性的捍卫,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讲,20 世纪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探索,是一个从自然到必然的过程;它们之

^① S. G. Shauk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gic and Mathematics in 20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 21 世纪,则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统一的动力学的发展过程。

那么,通过对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反思,当代科学哲学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最大的“引导性难题”又是什么呢?

第一,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要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范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没有明确逻辑起点的学科肯定是不完备的。

第二,构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彼此可以真正地相互交流和共同促进,从而使它成为科学哲学生长的舞台。

第三,探索各种科学方法论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新基底。在这个基底上,获得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有效统一,从而锻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理论与发展方向。

第四,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要持续地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一点,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关键的东西。同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谈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去谈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论、科学史学及科学文化哲学等流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否则的话,一个被消解了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

总之,这四个从宏观上提出的“引导性难题”既包容了 20 世纪的五個“引导性难题”,同时也表明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就在于: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进步越来越多元化。现在的科学哲学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这些多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愈加本质地相互渗透、吸收与融合。所以,多元化和整体性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将在这两个方面的交错和叠加中,寻找自己全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哲学拥有它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三大转向”的科学哲学,而今走向语境论的研究趋向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必然取向之一。

我们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学科,这些年来就是围绕着这四个面向 21 世纪的“引导性难题”,试图在语境的基底上从科学哲学的元理论、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探索科学哲学发展的路径。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

郭贵春

2007 年 6 月 1 日

目 录

总序	郭贵春 (i)
导言：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1
第一章 解释学在何种意义上适用于技术	10
第一节 技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10
一、技术哲学的兴起	10
二、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	15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与工具论	18
第二节 技术哲学的本质追问	20
一、本质主义及其技术理论	20
二、非本质、反本质与后本质主义	29
三、技术的含义与家族相似	36
第三节 技术的解释学意蕴	38
一、解释学的源流	39
二、科学解释学的兴起	47
三、技术理解的“前结构”	58
第四节 技术解释学的探求	61
一、工具的“上手”与“在手”	61
二、知觉与技术解释	66
三、“人-机”解释学关系	70
第二章 技术知识的解释学	76
第一节 作为知识的技术	77
一、技术并非应用科学	77
二、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	81
三、技术知识的独特地位	85
第二节 地方性知识	88
一、理解地方性知识	88
二、地方性知识的哲学意蕴	92
三、实践中的地方性技术知识	95

第三节 意会知识的解释学反思	98
一、不可言说的知识	98
二、技术理解的意会性	102
三、技术知识的意会性	106
第四节 意会知识与技术传播	109
一、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	109
二、意会知识与技术扩散	113
三、不可失而复得的知识	118
第三章 技术活动的解释学	122
第一节 技术建构的解释学向度	123
一、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到技术的社会形成	123
二、技术建构论的解释学策略	133
三、技术风格	139
四、行动者网络	141
第二节 技术设计的解释学	145
一、两种技术设计模型	145
二、技术设计与解释学循环	149
三、技术设计的“问答逻辑”	154
第三节 技术代码的解释学意义	156
一、作为前见的技术代码	157
二、技术的“社会意义”	160
三、技术的“文化视域”	164
第四章 技术人造物的解释学	168
第一节 作为本文的技术人造物	168
一、广义对称原则	168
二、技术调控	173
三、技术“正本”	177
四、技术创新与“多重正本”	181
第二节 技术人造物的功能意向性	186
一、技术的道德“授权”	187
二、技术的政治“场景”	193
三、技术的“可用性”	197
第三节 性别化技术正本	205

一、技术女性主义	205
二、技术的“性别正本”	209
三、技术的“驯化”	213
结语 可选择的技术	218
参考文献	222
后记	236

导言：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技术对人类社会巨大的推动力与破坏力，激励着人们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技术进行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对技术的理解，曾经一度为技术决定论所垄断。无论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都将技术视做某种超越历史和地域的自主力量，并由此主张全球趋向以西方社会为典范的现代化进程。芬伯格（A. Feenberg）将此称做“对现代性的技术理解”，并认为这种理解“设想了一种决定论的技术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社会是由技术进步来构造的，而技术进步又有赖于自然知识的进展”。但是，近20余年来关于技术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及相关跨学科探索，已促使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放弃了这一立场。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技术的多样性，探索现代化的多种可能路径。从时间维度来看，技术哲学正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而兴起，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关于技术哲学的历史回顾与主要观点，已经有诸多作品问世。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技术哲学如何从更多关注技术的社会价值、伦理及批判等方面的研究，转向对技术自身认识论问题的重视。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趋向亦做出了积极的“同步响应”，开始了“技术认识论转向”。在这一刚刚起步的行动中，探索者们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入手，明确宣称技术不是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是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立知识类型。因此他们认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其中部分人又祭起传统科学哲学的法宝，试图模仿科学哲学来构建技术哲学的认识论，典型者如皮特（J. Pitt）。在《思考技术》一书中，他声称绝大多数技术哲学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他指出：“本书的策略很清楚。科学哲学已经详尽地考察了许多对我们理解科学是什么、如何工作等至关重要的概念。……循着科学解释的路子，我寻求技术解释的条件……技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对某一特定的技术能够知道什么，其作用如何，技术知识与何种因素一致。”因此，虽然皮特强调了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不同，但却仅仅将技术哲学局限于认识论，而将技术的伦理、价值等分析排斥在技术哲学之外。故而有人揶揄皮特说：如同马克·吐温（M. Twain）所言，对于手头只有锤子者而言，他周遭看见的都是钉子。皮特以科学哲学为主要工具，到处看见的只是认识论问题。

应当说，确立技术知识的独特地位，对技术哲学研究至关重要。但对待技术

知识分类与组成的不同态度，却可能导致差异颇大的研究走向。区分技术知识的方法很多。概言之，技术知识可被划分为“可编码”和“不可编码”两类，这也大致相当于明言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划分。以此来看，皮特等以逻辑方法构建的技术认识论，主要是基于可编码技术知识运作的结果。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充分。原因不仅在于对意会知识成分的忽略，更重要的是：无视意会知识将导致技术认识在整体上无法得到保证与澄清。事实上，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此在解释学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解释学，对“意会”之于人类存在的意义都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和肯定。无论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结构”，还是伽达默尔理解的“前见”，都在本体论意义上肯定了意会理解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正是与此相关，存在着不同于技术认识论的技术解释学。就此而论，相对于笛卡儿（R. Descartes）身心之分及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而言，我们有理由断言：“当代技术哲学运动始于海德格尔。”^①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对伊德（D. Ihde）这一论断的理解，不同于当今谈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中十之八九主要言说“座架”、“持存物”的技术本质主义，而主要从《存在与时间》关于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之视角，特别是从海德格尔对传统认识论主客两分的矫正及其本体论解释学思考技术。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并非一个与世界对立、分离的主体。在他能清楚地认识世界之前，他已经存在于世，或者说“在世”了。他是被“抛进”世界的。此时，其周围世界、生活世界，已经在那里了。这样，由于人的“在世”，由于人的“被抛入”，其对世界就有一种前本体论的理解。任何的理解、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已经被给予但决不能完全主题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理解并非如近代哲学所确认的那样是一种认识模式，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理解与存在的同一性，也使得理解赋予任何解释以前有、前见与前设的“理解的前结构”。这意味着，人绝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他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理解的前结构始终隐而不显，它决定此在的理解和解释，却不能为人们条理分明地、理智地加以把握。“它就像宇宙间某些最隐蔽的法则，始终在起作用，却永远也不会被人清楚地把握。”^②然而，此在理解和解释却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我们要解释的东西，总是为我们的前有所规定的了。与此类似，伽达默尔对理解中“前见”意蕴的阐释，波兰尼（M. Polanyi）关于意会知识在人类认

① D. Ihde. *Instrumental Realism: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

② 刘放桐等.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493

识中前提性作用的分析，都强调了意会理解的重要性。因此，无视意会知识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便不可能恰当地认识、理解技术。在此意义上，较之某些过分“形式化”的技术认识论，笔者所倡导的技术解释学，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因为这种做法，是“不需要任何超验的假定而对世界的意义作内在解释的方法”^①。

在笔者看来，技术解释学的理论源头是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而现实的起点则始于三位至今健在且不断有作品问世的研究者芬伯格、伊德与拉图尔（B. Latour）的卓越工作，即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伊德的人—机现象学与解释学以及拉图尔的后结构主义技术符号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解释学首先是在批判技术决定论的语境中展开的。其中，强调社会对技术决定作用的技术社会建构论的众多经验研究，为人们重新审视技术的社会形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库”。当然，建构论者以社会决定替代技术决定的思想是有缺陷的，受到了包括拉图尔在内的研究者的激烈批评。

本书共四章。第一章探索了解释学在何种意义与程度上适用于技术，第二至四章分别就技术的三个主要方面——技术知识、技术活动、技术人造物进行了解释学研究。应当说，这一框架主要源于对技术含义的理解与界定。关于技术的定义和内涵，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并直接反映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走向。在论述中，笔者将技术概念的界定与反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思考相结合，认为我们事实上不可能做出超越时间、空间的抽象定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家族相似”的思想，来谈论和描述技术。例如，将技术看做关涉自然与创造的知识、活动及人造物，大致可以体现现代技术的特征。以下，就几个相关方面的问题作简要说明。

其一，对当今技术哲学理论的划分，主要以芬伯格的观点为依据。应当说，这种分类有助于厘清当今技术哲学的纷繁局面（表 0-1）^②。

如表 0-1 所示，纵表头有两种选择：技术是中性的或负荷价值的。横表头有两个选项：自主的或受人控制的。由纵、横表头组合形成四种观点。

（1）技术工具论，意指技术是中性的且能为人类所控制。这是标准的现代技术观念，即技术仅仅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或设备。

① [德] W. 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3

② 参见芬伯格发给笔者的电子文本：What i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现见于：<http://www-rohan.sdsu.edu/faculty/feenberg>

表 0-1 技术哲学理论的划分

技术	自主的	受人控制的
中性的 (手段和目的的彻底分离)	技术决定论 (如现代化理论)	技术工具论 (自由、进步的信念)
负荷价值的 (手段形成了包括目的的生活方式)	技术实体论 (手段和目的相关)	技术批判理论 (手段-目的可替代的选择)

(2) 技术决定论，是中性的与自主的两个维度的组合。它认为人类非但不能控制技术，反而受制于技术。该观点通常主张技术的能力来自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应用。

(3) 技术实体论，承认技术是负荷价值的，但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人类对技术只能听之任之，而无力干预其运行。在实体论者看来，选择不同的技术也即选择不同价值取向的生活。人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使用技术，本身就是在做出某种价值选择。技术实体论与决定论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大多数技术实体论者都持决定论观点。其区别主要在于，技术决定论对技术和人类前景通常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而实体论或本质论者对技术往往是批判的，甚至是悲观的。前者向往由技术引领的美好“乌托邦”，后者则断言技术如脱缰野马般将人类带入邪恶的“敌托邦”(dystopia)。海德格尔后期《技术的追问》反复强调的，正是实体论的观点。

(4) 技术批判理论，既承认技术有价值负荷，也认为人类可以控制技术。这种观点同意技术可能具有潜在的危险，但不像实体论者那样消极、宿命地等待“上帝的拯救”，而是相信人类有能力以某种民主化的技术决策趋利避害。其所强调的是多种技术的可选择性，这是芬伯格的观点。

其二，“技术本文”何以可能的问题。笔者从如下方面寻找依据：

(1) 塞尔(J. R. Searle)、克罗斯(P. A. Kroes)关于技术人造物的“两重属性”区分。克罗斯认为，技术人造物既包括物质性的结构，又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客体。前者与人的意向性无关，其行为受自然规律支配；后者则取决于人的意图，是在人类行为的语境中，用以达成一定目的之手段。或者，如塞尔所言，技术是以语义的而非语形的形式存在着的。虽然这样的区分仍有笛卡儿式的身心分离的痕迹，但其关于人造物意向性的思想，对于我们将技术特别是技术人造物视做本文意义颇大。

(2) 芬伯格的初级、次级工具化理论。芬伯格在初级工具化层面，保留了技术本质的概念；而在次级工具化层面，强调了技术人造物的“再语境化”和

用户“挪用”(appropriation)^①的可能。这使得他所倡导的技术客体的两个解释学维度——“社会意义”与“文化视域”成为我们将技术看做本文的一个重要依据。

(3) 伊德从知觉现象学出发对人—机解释学关系的研究,更为直接地讨论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及人的知觉与更广阔文化背景的关系。他用“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来表达这种联系。伊德将技术(如仪器)显示的世界称为“技术本文”,以此表明人类的理解和认识并非只是被动地依赖技术手段,而是有着理论负荷或前见的解释过程。

(4) 技术本文的概念在拉图尔等的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拉图尔从广义对称原则出发,赋予非人客体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从而模糊了主体、客体的界限。他将“铭记”着设计者旨趣的技术人造物称为“正本”或本文,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意义下,拓展了技术本文的概念及解释的可能性。在此,就解释学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关系略作说明。根据帕尔默(R. E. Palmer)的研究,解释学与结构主义并非同宗同祖。然而,“从结构主义导致了对阅读原文的过程的一种恰当的理解这一点来说,它起到了解释学的作用”^②。符号学所包含的东西,似乎比解释学要更为广泛。然而,“哲学解释学,作为哲学,要对这种解释过程的模型所蕴含的语言观点和有关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人类观念进行批判的探

① P. 利科在阐述其文本解释理论时,受到了海德格尔对理解和解释的生存论分析影响。事实上,如同海德格尔关于听的现象学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离开了听者的倾听或离开了读者的阅读。这种倾听和阅读的过程作为理解和领会的模式也就是文本、作品的存在的“筹划”过程。而这种“筹划”与其说是听者、读者“主观”意图的体现,还不如说是文本本身“被抛入”存在,尽管这种“被抛入”离不开理解和领会本身的“前有”、“前见”与“前设”的结构;也正是因为理解和领会的这种不断“筹划”和“被抛入”的性质,文本的意义才得以不断丰富和不断更新。所以利科又将这一作为理解的阅读、解释过程称为“自得”(aneignung),并将之解释为一种辩证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文本与作者各自不断达成自身的生成和再生成。利科还表示:“appropriation 是我对德文术语 aneignung 的翻译。aneignen (德文动词)的意思是说将原先‘异己的’变为‘本己的’。依照这个词的内涵,全部解释学的目标就是要同文化间距与历史异化作斗争。”引用与转引自:王庆节. 解释学,海德格尔与儒道今释. 16, 17. 参阅: P. 利科. 解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162, 163

不过,霍埃认为:利科想通过“挪用性”而“调和结构主义方法与哲学解释学方法的企图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发生了冲突,也为他自己制造了困难。但无论如何,利科也是把解释学循环看成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则,而不是心理学原则的。”参阅:霍埃. 批评的循环. 112

芬伯格在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和 *Questioning Technology* 等作品中,从多个视角讨论了技术的“自得”或如本书笔者所称的“挪用”问题。例如, Roger Silverstone 将文化研究应用于技术而提出的“reception theory of appropriation of technology”,即所谓技术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技术争论与技术评价中的创造性“挪用”;技术挪用的社会语境化(social contextualizations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technology);以及技术的“再挪用”(reappropriations)等问题。在阅读上述作品及其与芬伯格先生的通信交流中,笔者深切感受到利科解释学思想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确曾产生一定影响

② E. 帕尔默. 解释学. 哲学译丛, 1985, (3)

索”。因此，笔者认为，拉图尔源自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技术正本，同样适用于技术解释学研究。

其三，就技术本文的生成及其客观性而言，技术解释学是处在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张力下的一种理论。说它具有后现代意蕴，是因为其存在着明显的关于技术的反本质、反基础的成分。这在技术建构论的纲领、拉图尔等的范式及芬伯格的技术代码、帕芬博格（B. Pfaffenger）的技术场景、技术女性主义的“性别正本”等概念中都有体现。另一方面，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也被认为是兼具现代与后现代成分的理论。^①而哲学解释学，正是我们所言的技术解释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技术本文诠释的客观性来看，相关技术研究都表现出了现代与后现代的融通。例如，建构论者在论及笔者称之为“作为本文的技术人造物”的社会建构时，既强调技术人造物的“解释灵活性”，重视相关社会群体的不同理解对技术本文意义形成的影响；同时，也引入协商、争论结束、稳定化等概念和机制，以确保技术本文不至于成为没有限制的任意约定。拉图尔等的“技术正本”，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铭记”与“解读”的符号学含义。在此，技术设计者、生产者如同文学作品的作者一样，预先在产品中“铭记”其意欲传达给使用者或者说“读者”的意图。这些做法使得人造物本文具有某种“顽固性”（obduracy），并以此规定着用户“应当”如何解读这些本文。另一方面，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事实上却并非被动地复制、接受作者意图。相反，不同用户总是根据自己的前理解结构或旨趣，“颠覆性地”阅读人造物本文，“驯化”技术本文，甚至如帕芬博格所言的那样实行“反赋义”（countersignification），从而以不同于设计者意图，或者以设计者始料未及甚至完全相反的用法，使用既有的人造物。

从解释学来看，上述技术本文的客观性，既不同于传统解释学“作者中心论”的观点，也不似德里达（J. Derrida）激进解构思想那样极端，而是与哲学解释学对本文客观性的理解相符。具体来说，19世纪传统解释学家，主要是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与狄尔泰（W. Dilthey），将理解看做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由于所理解的对象与理解者之间的“历史距离”，因而这种重建只有在过去和现在、本文和解释者之间搭起桥梁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狄尔泰认为，本文即作者意图与思想的“表达”（Ausdruck）；解释者必须把自己置入作者的视界之中，才能复活其创造行为。或者说，不论时间差距有多大，凭借作者与读者之间

^① 例如，一些研究者将“由海德格尔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称为新解释学，并认为：新解释学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在诸如理解的主体、对象、解释目的以及理解与历史、理解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中，新解释学的结论都导致否认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性观。新解释学不承认理解具有确定性，同时对解释的客观性也持否定的态度。鉴于这些见解，尽管新解释学并未有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展开后现代话题，但它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引自：赵光武：《后现代主义哲学评述》，2000。北京：西苑出版社。48~65